*“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1905年，中国学界围绕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救亡图存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传统上认为的革命，是有别于叛乱、造反、政变和独立战争的。革命通常被认为是有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而改良(改革)是主动的，是可选择、可设计、可调节而又循序渐进的。改良派认为当前中国国民愚劣，实行共和民主没有前途；而革命派认为清政府已是中空朽木，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免亡国之祸，并且认为革命迫在眉睫。这场论战持续到1907年已是高下可判，“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部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

历史上最著名的革命当属法国大革命。法国在政治上是最早熟的国家，却一直没有建成完善的民族市场，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法国资产阶级也比英国要晚熟一个世纪之久。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君主制在国内积累了大量的不平等和过度的专制。18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启蒙运动(Siècle des Lumières)在法国盛行。它提倡科学、理性和进步，认为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是不断进步的，认为用科学的手段就可以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平等思想由此传播，“人人生来平等”深入人心，被唤醒的民众们谴责一切特权、极度向往平等。启蒙运动给欧洲民众带来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是极为深刻的。

18世纪及之后，法国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陆陆续续地爆发了一系列人民起义。法国在18世纪晚期爆发的攻占巴士底狱的行动实际上就是一种民众对特权的愤怒，这一行动既无政党组织领导，亦无行动纲领，纯属民众自发的激情行为，但这一行动为之后的法国政治民主化埋下了火种，即广大的人民亦要证明自己人权的合法性。短短一百年内，法国经历了多次政治体制的轮番更替，法国大革命也因此被称为是近代政治科学的实验室。代价是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儿女，各方建立统治的企图蹂躏着法国的国民，在此情形下，只有暴力的战争才是现实的和可能的。今天我们反思法国大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发现前者是如此的激进且参与阶级又是如此的广泛，因此革命发展得十分彻底，代价也极为惨重。但是这惨重的代价亦能换取历史的进步以作为补偿。

1905年代的清政府想要再利用改良派来维护统治，或者说改良派想再通过政治维新来救亡图存的成功率已然微乎其微。一个政府要想顺利地实施改革，这个政府必须有权威。权威不等于权力，后者是一种强制力，即人们可能要服从它，但不一定信仰它，也即中国所讲的“敬”。一个政府有权威，这个政府在实施决策时就能够减少成本。亨廷顿认为，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们可以有秩序而没有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没有秩序。必须先有权威，才能对国民加以限制。因此摧毁封建特权和封建束缚，自然而然地能为新社会集团的崛起和新的经济活动发展铺平道路，这是历史所决定的当前事务，因此一个逆历史潮流而负隅顽抗的政府，岂能继续存在？

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晚清政府在20世纪10年代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均告失败，其中铁路国有政策更是引爆了由各种社会矛盾积聚而成的火药桶。清政府此时已彻底沦为卖国机构，而国民又深受爱国民主思想洗礼，一场推翻清廷的革命在时机成熟之时立即爆发。